

# 榜样表彰载体的时代变迁与红色文化传承

王迪钊

**摘要:**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榜样表彰载体的形态随着时代主题变化、科学技术进步、党的建设需要以及地域风俗差异等因素发生了深刻变迁:在数量上呈现由单一向多样化发展,在技术上呈现由实体向数字化转变,在制度上呈现由分散向体系化演进,演绎出榜样表彰载体形态的多维嬗变与创新发展。不过,由党的性质决定的榜样表彰载体的内在特质却始终没有改变,呈现出典型性与荣誉性、实用性与美观性、传承性与创新性、精神性与物质性的内在统一。当前,需要进一步挖掘榜样表彰载体的红色文化基因,讲好榜样表彰载体的红色历史故事,打造榜样表彰载体的红色文物场馆,创新榜样表彰载体的红色资源传播,让榜样表彰载体在新时代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汇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正能量。

**关键词:**榜样表彰载体; 中国共产党; 先进典型; 榜样精神; 红色文化传承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5.02.002

马克思恩格斯经常提到“榜样”。例如,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序言》中指出:“如果没有英国工联运动和法国工人政治斗争的榜样……我们现在会处在什么境地呢?”<sup>①</sup>列宁指出:“某个国家的某个地方实际行动起来的活榜样的作用,比任何宣言和任何会议都要大,正是这点使各国劳动群众感到振奋。”<sup>②</sup>毛泽东同志也指出:“要使全国人民都信服我们所指出的道路的正确性而拥护我们,而参加革命奋斗,需要我们拿建设的榜样给他们看,才能作得到。”<sup>③</sup>

回望中国共产党走过的一百多年历史,党内榜样模范辈出,先进典型不断涌现。表彰榜样、典型示范也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改天换地打江山、战天斗地搞建设、惊天动地抓改革的重要举措。选择什么样的载体来表彰先进典型显然是一种政治行为。这种“载体”需要从广义上来厘定意涵,即“一切能够承载其他事物的事物”,除了能够承载榜样表彰的具体形式,比如语言、文件、称号、奖品、仪式等,还包括榜样本身。榜样表彰载体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伟大实践,记载着无数中国共产党人的先进事迹和高尚品德,彰显着他们为党为国为人民的榜样精神,更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艰辛与荣耀。爬梳中国共产党榜样表彰载体的发展历程,其形态虽历经百余变迁,其内在特质却始终保持如初。作为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的重要表征,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对党内榜样表彰载体做好理论阐释和红色文化传承,有助于进一步开展新时代榜样的表彰工作,汇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正能量。

## 一、榜样表彰载体的形态变迁

形态是事物在特定环境中的表现形式,可以被感知与理解。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榜样表彰载体的形态随着时代主题变化、科学技术进步、党的建设需要以及地域风俗差异等因素发生了深刻变

**基金项目:**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攻关计划项目“中国共产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进程与经验研究”(2023QN118);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中国共产党坚持敢于斗争的历史进程与经验研究”(23NDJC187YB)。

**作者简介:**王迪钊,中国计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杭州 310018; wangdz@cjlu.edu.cn)。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7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5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25页。

迁,在数量上呈现出由单一向多样化发展,在技术上呈现出由实体向数字化转变,在制度上呈现出由分散向体系化演进,演绎出榜样表彰载体形态的多维嬗变与创新发展的。

### (一)载体数量由单一向多样化发展

事物的发展离不开量变的积累,其发展轨迹以具体的形式变化得以展现。一个没有量变积累的事物,必然也不会有改变自身性质的质变发生,当然也就根本谈不上发展。考察中国共产党榜样表彰载体的百余演变历程,可以发现,其在数量上呈现出由单一向多样化形态发展的理路。据历史考证,最早的党内表彰发生在建党之初。1923年,陈独秀同志指出:“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sup>①</sup>以口头嘉奖形式表扬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湖南党组织的工作,鼓舞了湖南省党员同志的革命热情。据此可以看出,口头嘉奖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非正式的党内表彰载体。

列宁指出:“现在用言语既不能说服工人,也不能说服农民,只有用榜样才能说服他们。”<sup>②</sup>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随着革命形势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开始注重榜样选树和表彰工作,并通过颁发荣誉奖章这种载体来鼓舞同志们参加革命斗争。譬如: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设立“红旗勋章”,1933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设立“红星奖章”,可以说这都是中国共产党榜样表彰载体的最早样式,成为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来榜样表彰载体的基本方向。毛泽东同志指出:“没有适当的奖惩制度,是不能保证劳动纪律与劳动积极性的提高的。”<sup>③</sup>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也非常注重以举行表彰仪式、授奖授旗的形式表彰各类模范,开创了群众性的表彰颁授仪式和载体,以凝聚社会力量、扩大表彰影响。譬如:1933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华苏维埃政府召开的表彰仪式上表扬武阳区的春耕模范,授予武阳区与石水乡奖旗。6月2日,党中央与中革军委称“扩红”5000余名的瑞金县为“模范县”,并授予奖旗。同年,上杭县才溪乡人民在生产支前、“扩红”等工作中作出了突出贡献,中央苏区和福建省苏维埃授予其“第一个模范区”称号,并拨款建成光荣亭。1934年1月,毛泽东同志亲自表彰“扩红突击运动中最优胜”的瑞金县、“在白区猛烈扩红1300名”的红三军团等。此外,开庆功会、戴英雄花、敬庆功酒等别出心裁且富有成效的表彰形式,也成为这一时期表彰英雄模范的重要载体。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重视在边区生产和革命运动中树立榜样,以“七一”为契机通过报刊宣传先进事迹。譬如:《抗敌报》于1938年刊发党员周建屏同志壮烈牺牲的事迹,《大众日报》于1942年宣传党员模范马竞生和刘晨光两位同志抗日牺牲的事迹。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也采用亲笔题词的形式载体激励先进典型。譬如:1943年1月,毛泽东同志给延安县委县政府题词“发展经济的模范”。同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出台《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规定给予书面、物质和口头等奖励,从而奠定党内奖励的范式。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50年9月中央政务院召开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和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毛泽东同志评价他们“是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sup>④</sup>。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大力表彰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模范。譬如:在工业领域,鞍钢工人孟泰带领工友建成著名的“孟泰仓库”,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在农业领域,申纪兰积极带领妇女下田劳动,被农业部授予“农业增产模范”。随着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在中华大地展开,各条战线上不断涌现出业绩突出、品格崇高的先进模范人物。譬如:毛泽东同志亲自选编了浙江省8个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典型材料,并为其中的7篇写下了批示。他热情地赞扬慈溪县五洞闸办起合作社是“了不起的事例,应当使之传遍全国”<sup>⑤</sup>;

① 《陈独秀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96页。

② 《列宁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7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64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5页。

⑤ 《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永远指引浙江人民胜利前进》,《浙江日报》1977年9月8日,第2版。

表彰建德县“合作化模范邓家乡”的领导路线“就是我党在全国一切群众工作中早已行之有效的一条著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sup>①</sup>；表扬建德县千鹤高级社，“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sup>②</sup>。毛泽东同志的批示，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推动了农业合作化运动蓬勃发展。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党和国家适应新时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对先进模范的新要求，不断完善荣誉表彰载体。比如：全国总工会从1985年开始开展全国五一劳动表彰活动。1989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对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党务工作者进行表彰。2000年开始，每年评审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等，表彰了一批批勇于创新的科技工作者。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也开始对在应对突发性事件中的先进模范进行表彰。譬如，表彰汶川地震抗震救灾工作的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等。

进入新时代，党中央高度重视功勋模范表彰工作，引导广大党员群众见贤思齐，对标先进，担当作为。2015年，党中央授予102名同志“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称号。2016年，授予100名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100名同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300个基层党组织“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2017年，中国共产党新设立“八一勋章”。2019年，首次开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集中评选和颁授。2021年，首次开展“七一勋章”评选。2023年，党中央、国务院首次开展“国家工程师奖”表彰。2024年1月，81名工程师在人民大会堂获颁奖章和证书，50个团队获颁奖牌和证书。

综上所述，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榜样表彰载体从无到有、从一元走向多元，不同历史时期的表彰内容和表彰形式各不相同、各具特色，载体不断丰富、持续升级，见证着一批又一批的先进典型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所建立的不朽丰碑。

## （二）载体技术由实体向数字化转变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事物形态不断由实体形态走向数字化形态。考察中国共产党榜样表彰载体的演变历程，可以发现其基本样态在传承发展中不断得到创新，在技术上呈现出由实体形态向数字形态的转变理路。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注重运用报纸等载体宣传先进党组织和优秀党员，呼吁全党向先进看齐、向先进学习。譬如：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道了瑞金县春耕生产竞赛中的妇女典型，并增设专栏《红板》刊登表扬好人好事。《红星报》在红军万里长征中连续出版，1935年1月刊发强渡乌江的事迹。《解放日报》大力宣传模范人物，比如《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1943年5月刊发八路军陈宗尧、左齐两位同志密切联系群众、善于团结人民的感人事迹。此外，《新华日报》《八路军军政杂志》等也积极宣传模范榜样事迹。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继续利用传统纸媒宣传榜样事迹。譬如：1981年12月，《人民日报》首次对张海迪同志的事迹进行了报道，张海迪的名字随即传遍了全国。1987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编写了《新时期的先锋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事迹选编》，2001年又编写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风采录》，集中宣传优秀党员的先进事迹。此外，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还以先进事迹报告会、座谈会、表彰会、巡回演讲为榜样表彰载体，让榜样的力量更好地传播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逐步尝试运用网络和新媒体技术宣传榜样的典型事迹。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中国共产党榜样表彰载体的形态逐步从实体形态向数字形态演进。譬如：电视机和互联网的普及使得中国共产党榜样表彰的载体日益数字化。2003年，中央电视台（以下简称央视）全力打造《感动中国》精品栏目，通过投票推选出为现代化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人物，弘扬了袁隆平、杨利伟、屠呦呦、钟南山、张富清等众多功勋模范人物的精神品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和“创先争优

<sup>①</sup>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27页。

<sup>②</sup> 《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记千鹤妇女在三大革命中的事迹》，《浙江日报》1970年3月8日，第2版。

优”活动中,人民网、新华网进行投票推荐优秀共产党员,使评选更加公开透明,也促进了先进事迹的有效传播和广泛宣传,使榜样表彰真正取得实效。201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在央视直播,央视网也进行专题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向抗战老战士老同志、抗战将领等代表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2021年6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京举行,央视进行实时直播,“七一勋章”获得者风采在全网宣传,不断激励着党员群众在各自岗位上奋勇拼搏。

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榜样表彰载体从实体层面到数字层面的迭代升级,充分发挥了互联网传播速度快、受众面广、影响力大的特点。从报纸到网络,从传统媒体到新兴媒体,依托现代媒介技术使得亿万观众同时“在场”,使讲述更接地气,真正走进群众心坎里,让榜样的事迹广为传颂,榜样的精神穿越时空、引发共鸣。

### (三)制度形态由分散向体系化演进

考察中国共产党榜样表彰载体的历史变迁,一条主线是器物层面的,另一条主线是制度层面的。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榜样表彰载体从具体的物品样式到更为深层的制度建设都历经时代变迁,共同构成榜样表彰载体的嬗变之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考虑到革命的繁重性、艰苦性,中国共产党开始通过出台表彰条例、发布表彰文件等形式鼓舞士气。譬如:1932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局印发《关于革命竞赛与模范队的问题》的“第8号通知”,要求“在报纸上,在会议上,应有系统地发表和报告好的模范队和好的模范队员的成绩,称扬他们的英勇”<sup>①</sup>。1933年7月,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颁授“红星奖章”的命令,明确指出红军军人为争取人民解放而牺牲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作出的牺牲红军给予表扬,赞扬其优异的品质和功绩,以达到激励后来人的目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党在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大批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自1939年起诸多奖励条例相继颁发,如《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例》《机关、部队、学校人员生产运动奖励条例》等,这些条例详细规定了劳动英雄模范的评选条件与办法。1943年,中国共产党制定《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与模范生产工作者大会及其代表的选举办法》,明确评选范围、标准和方式。另外,在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还先后印发《关于八路军奖励问题的指示》《关于“八一奖章”指示》等制度性文件,规定英雄模范表彰标准和奖励办法。

党章是最根本的党内法规,是管党治党的总规矩。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增加“奖励与处分”章节内容,以“根本大法”的形式明确了党内表彰相关制度,对党组织和党员的奖励与处分及其实施作了明确规定。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首次通过政府法律建立国家功勋荣誉制度,要求“制定并颁发国家的勋章、奖章,制定并授予国家的荣誉称号”。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规定勋章、奖章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决议》规定了党内奖章勋章的授予标准,颁发给新民主主义革命各个时期参加革命的有功之人。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恢复发展、趋向完善。1988年,邓小平同志签署中央军委命令并公布新的规定,11万余名军队离休干部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功勋荣誉章。1980年,全国总工会制定了《劳动模范工作暂行条例》,使劳动模范评选表彰有了法理依据。此外,1989年9月,党中央开展全国性党内表彰工作,江泽民同志称其为“这在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sup>②</sup>。此后,以中央名义在党内开展榜样表彰工作不断以文件和法规载体规定下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项固定制度安排。与此同时,在科技领域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明奖励条例》,在行政领域出台《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并不断修

<sup>①</sup> 《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652页。

<sup>②</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时期党的建设文献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70页。

订完善。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党内表彰制度”<sup>①</sup>，这正是对中国共产党长期开展党内榜样表彰的完全肯定，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榜样表彰载体的制度化建设，形成了“1+1+3”的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具体来说，201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的意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2017年，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制定党内功勋荣誉表彰条例、国家功勋荣誉表彰条例、军队功勋荣誉表彰条例。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中国共产党以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节日为时间节点，开展一系列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活动，推动了榜样表彰制度稳定健康发展。

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榜样表彰载体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的不断规范与完善，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对榜样表彰载体认识的持续深化，也进一步发挥了制度的鲜明价值导向和强大的引领作用，在全党全社会营造了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

## 二、榜样表彰载体的内在特质

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榜样表彰载体的形态不断变迁发展，但党的性质决定的榜样表彰载体的内在特质、党内表彰载体内蕴的崇高价值却始终没有改变。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榜样表彰载体呈现出典型性与荣誉性、实用性与美观性、传承性与创新性、精神性与物质性的内在统一。

### （一）典型性与荣誉性相统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现实的人”存在多种层次的需要，追求物质、精神、交往等方面的需求。典型则能对人的思想、行为等产生示范作用。毛泽东同志指出：“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sup>②</sup>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什么样的典型，就能体现什么样的导向，就会收到什么样的效果。”<sup>③</sup>对先进典型开展表彰，给予荣誉性表扬和嘉奖，体现了对表彰对象行为和价值的肯定，从而满足先进典型在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的需求。选择具有典型性和荣誉性的奖品作为表彰载体，能对他人或社会起到启迪、教育、引导和激励等作用，最终目的是凭借此种载体凸显先进典型的带头表率作用和精神领航价值。相应地，榜样表彰载体本身也具有典型性特征。2019年7月1日，党中央印发《勋章、奖章、纪念章管理办法（试行）》，规定了勋章、奖章、纪念章设计制作的总体要求。其中，“共和国勋章”、国家荣誉称号以及功勋簿等，都是榜样表彰载体典型性特征的外化彰显。

荣誉性是中国共产党榜样表彰载体的基本属性。党内活动的有效开展，离不开一定的政治仪式。邓小平同志指出：“颁发奖牌、奖状是精神鼓励，是一种政治上的荣誉。”<sup>④</sup>颁奖仪式作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一种政治仪式，旨在通过举办大型会议为党内先进典型颁授奖章、证书和奖品等，营造庄严肃穆的氛围，凸显政治记忆、增强政治认同。实质上，榜样表彰的颁授仪式以及各类勋章奖章、荣誉墙、光荣榜等都是重要的物质载体，有利于让受表彰对象感受到表彰的仪式感。譬如，“红旗勋章”“红星奖章”在精神上满足了红军、群众对荣誉的需求，激励了广大红军指战员奋勇保卫中央苏区。

### （二）实用性与美观性相统一

中国共产党榜样表彰载体具有实用性与美观性相统一的内在特质。在实用性方面，中国共产党榜样表彰载体始终凸显了其使用价值。譬如：搪瓷缸子经常作为表彰先进的奖品。有一首被石油工人广泛传唱的名为《搪瓷缸》的歌曲，歌词是这样的：“陈列馆，搪瓷缸，服务人民真高尚；大会战，岁月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56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7页。

③ 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12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2页。

里,石油工人带身旁;渴了用它盛水喝,三餐盛饭里边装;搪瓷缸,搪瓷缸,石油会战上战场,抗美援朝作贡献,你说荣光不荣光。”又如,张富清同志在武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学习期间,获得了一枚纪念章和一只搪瓷缸。日后,张富清同志工作的地点一变再变,但在他随身携带的物件里,始终有这只搪瓷缸。时间久了,搪瓷缸被磨破,张富清同志拿牙膏皮补好后继续用。补了又补,实在没法再用,他就拿来装牙膏。纵观中国共产党榜样表彰的载体演变,印着“劳动模范”等字样的跨栏背心,也经常作为先进生产者的日用奖品,成为一个时代的先进印记。

在美观性方面,中国共产党榜样表彰载体经过精心设计,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形象。譬如:一等“红星奖章”为金制,呈十角星芒状,中心圆圈处有红色珐琅五角星;“红旗勋章”呈圆形,中间有五角星,圆形中心处有一面旗。从榜样表彰载体的审美价值出发,两者均采用“红色”,代表着革命、斗争和浪漫。又如,“七一勋章”将党徽、五角星、旗帜、丰碑、祥云等具有象征寓意元素融为一体,让人们快速将所见的实物与党和国家的形象联想起来。再如,2023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首次开展“国家工程师奖”表彰,奖章整体采用国徽形状,中间的五角星与天安门元素象征国家荣誉,外围的旗帜寓意“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样的工艺和创意,既彰显了国家精神和国家意志,又展现出工程技术的新发展。

### (三)传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

中国共产党榜样表彰载体具有传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的内在特质。一百多年来,证章是中国共产党榜样表彰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当然,证章始终坚持传承与创新。譬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苏区,党设立“红旗勋章”和“红星奖章”,为党内榜样表彰证章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党坚持将红旗、红星作为榜样表彰载体的基本符号,晋察冀军区大功奖章、英雄奖章、勇敢奖章、艰苦奋斗奖章等都以此为主要符号。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最为明显的是纪念解放战争所设立的解放系列纪念章,均以红旗、红星作为纪念章的主要符号。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9年3月23日、10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对战时和平时授予奖章作了统一规定。21世纪初,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结合形势特点和军队建设需要,设计制作了英雄模范勋章和卫国戍边、执行作战等纪念章,红旗、红星符号是主要元素。进入新时代,三大功勋荣誉奖章、解放军新式勋章始终含有红旗、红星符号。譬如:2016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设立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章,主体造型为红军时期的八角帽,章体中心为红星,与苏区“红星奖章”较为契合,章体上部有多面红旗,对苏区“红旗勋章”有相应的参考,这一设计充分体现了对苏区时期勋章奖章的传承。

必须强调的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榜样表彰载体迎来了快速发展。在类别设置上,榜样表彰证章包括勋章、荣誉称号奖章或奖牌、表彰奖章或奖牌、荣誉性的纪念章四种类型。在等级设置上,“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中共中央及其工作部门、中央纪委颁授的证章冠以“全国”等级,其他的证章冠以地区、单位等级。

### (四)精神性与物质性相统一

精神激励和物质奖励是中国共产党榜样表彰办法的两种基本方式。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实行精神鼓励为主、物质鼓励为辅的方针。”<sup>①</sup>一百多年来,精神激励为主、精神激励和物质奖励并举,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榜样表彰的基本原则。

建党初期的口头嘉奖属于精神激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将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精神奖励为主,辅之以必要的物质奖励。其中,精神奖励包括颁发奖章、奖状等,此外还包括领导人接见、题词、宣传报道、设立纪念碑等;物质奖励包括给予纪念品或奖品,如骡子、马、鸡、鸭等牲畜,驳壳枪、子弹等作战工具,斧头等生产工具,毛巾、盆碗等生活用品,有的甚至给予现金奖励。譬如: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给具有特殊成绩者的奖品,包括需求量大的日用品、奖金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02页。

等物质奖励。1941年,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对模范劳动者采用精神奖励的办法,比如参加“五一”大会并坐在最前排、受到总工会招待、参观延安工厂等。1943年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奖励25个团体和个人,给团体的表彰载体是红绸锦旗,给个人的表彰载体是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的奖状以及毛毯。1944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选举与奖励办法的决定》,精神奖励为颁发奖状、奖章和奖匾等,并按等级将模范事迹在不同区域进行宣扬。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继续同时运用物质奖励与精神激励,尤以精神激励为主的奖励办法更为凸显,比如党坚持以奖励荣誉称号、宣传先进事迹为主的精神激励,并辅以适当的物质激励。2003年2月14日,央视新闻推出《感动中国》节目,以电视媒介仪式形式将道德规范投射给观众,很好地发挥了模范引领作用。新时代以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的意见》规定,坚持以精神激励为主,充分发挥其精神引领作用,推动全党全社会形成崇尚先进、尊爱英雄的良好风尚。《中国共产党党内功勋荣誉表彰条例》指出,党内功勋荣誉表彰要遵循“以精神激励为主”。《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待遇规定(试行)》规定了“精神激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以精神激励为主”原则。在具体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授予英模人物的最高待遇,是由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亲自颁发荣誉证书,并与获奖者合影或交谈,这正是榜样表彰载体精神性与物质性相统一内在特质的时代升华。

### 三、榜样表彰载体的红色文化传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sup>①</sup>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榜样表彰载体具有重要的红色文化属性。当前做好红色文化传承弘扬工作,需要挖掘榜样表彰载体的红色文化基因,讲好榜样表彰载体的红色历史故事,打造榜样表彰载体的红色文物场馆,创新榜样表彰载体的红色资源传播,让榜样表彰载体在新时代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绽放夺目光彩。

#### (一)挖掘榜样表彰载体的红色文化基因

器以载道,物以传情。从中共党史来看,中国共产党榜样表彰载体是重要的革命文物,承载着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文化基因,记载着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非常注重加强革命文物保护,把传承红色基因视为全党的共同责任。

回顾党史,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渐形成了以红色文化为主的榜样表彰制度。这一时期,“红旗勋章”“红星奖章”的特征与内涵,源于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当前,可以对“红旗勋章”“红星奖章”的造物溯源和载体特征进行研究,挖掘、展现革命文物的红色文化基因和政治内涵,同时可以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开发革命文物体系,运用符号嫁接、衍生、融合、再造的手段,让红色文化基因再生为人民日常感知的美好生活需要,满足美好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 (二)讲好榜样表彰载体的红色历史故事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sup>②</sup>由于网络技术的助推,少量视频主播和八卦博主受西方影响,不顾历史的严肃性,丑化英雄模范,歪曲党的历史、新中国史、人民军队史,造成了恶劣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英模人物的事迹绝不容否定。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中已经形成了榜样表彰的优良传统,形塑了党员模范和时代楷模形象,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面貌。比如,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中“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

<sup>①</sup> 《习近平在视察南京军区机关时强调 贯彻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扎实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人民日报》2014年12月16日,第1版。

<sup>②</sup>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3页。

“为人民利益而死”的张思德,抗美援朝战场上“最可爱的人”邱少云、黄继光,带领人民战盐碱、斗风沙的焦裕禄,“铁人”王进喜,勇攀科学高峰的华罗庚,“人民好公仆”孔繁森等。他们是时代精神的传递者、主流价值的塑造者、社会潮流的引领者。他们在各自的时代背景、峥嵘岁月里是如何一步一步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做到为人民服务,最终成为榜样人物的? 又是如何由一个人影响一群人、最终带动一片人的? 这些榜样人物背后的历史故事是生动而鲜活的教科书和营养剂。

那么,如何通过讲好榜样表彰载体的故事以及其背后蕴含的党史故事,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这是重要的时代之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sup>①</sup>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我们要讲好中国共产党榜样表彰载体中的党史故事,展现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一往无前、奋勇前进。

### (三)打造榜样表彰载体的红色文物场馆

列宁指出:“在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里以后……榜样的力量第一次有可能表现自己的广大影响。”<sup>②</sup>中国共产党榜样表彰文物是革命精神和红色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这些文物是弘扬革命传统和革命文化的历史教材,向人民无声地讲述着“红色政权是怎么来的”。

如何把中国共产党榜样表彰载体文物保护好,发挥好其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的作用,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因此,有必要打造榜样表彰载体的红色文物场馆,做好收集、整理、修复、展览、研究等一系列保护管理工作。只有这样,革命文物才能有个“家”,红色基因才能更好地代代相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些党史上的榜样表彰载体散落在地方的有关文献里,因缺少广泛的关注、梳理和研究,一直没能发挥出其教育功能,这些榜样表彰载体必须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挖掘。

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等是党和国家的红色基因库,是展示榜样表彰载体保护利用的重要“窗口”,是让榜样表彰载体“讲故事”的“讲台”,是传承榜样表彰载体红色基因的“桥梁”,它们在促进红色江山世代代传下去方面具有特殊作用,能够为社会各界参观学习榜样表彰载体提供固定的场所。另外,还要发挥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基地作用,大力发展红色文旅产业,丰富优质红色文旅产品供给,推动红色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度融合。

### (四)创新榜样表彰载体的红色资源传播途径

如今,借助文艺创作以及互联网技术,全景、动态地呈现中国共产党榜样表彰载体的样态与历史,是增强革命文物吸引力与传播力的有效途径。

当前,5G、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等新兴技术不断涌现,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网络信息传播呈现移动化、个性化、休闲化、互动化等特点。我们要充分运用各类传播方式,通过新形式、新手段、新途径讲好红色故事,赓续红色血脉。

在年轻化、数字化为红色文物展示创新赋能的背景下,红色文化破圈传播大有可为,如线上红色展厅、音视频专辑、舞台表演等多种创新展示,可以为提高红色文化传播效率提供契机。短视频、广播、音频等传播方式使红色文物融媒体传播成为常态,利用VR、AR、3D扫描等新技术打造数字文物,为观者带来沉浸式体验,极大提升了红色文物展览展示的呈现效果,更好、更完整地传递出其背后所承载的革命精神。乘着5G东风,即可轻松拥有可随身携带的红色文物博物馆,PC端、移动App、微博、微信等多平台、多渠道传播,让红色文化花开遍地、深入人心。总的来说,创新榜样表彰载体的红色资源传播途径,就是要找准多媒体融合创新这个抓手,用好互联网融媒体平台这个主渠道,将红色文化资源与新媒体深度融合,创新创造出一大批技术先进新潮、体验观感良好的榜样表彰载体展示成果,统筹网上网下,大力推进榜样表彰载体数字化保护、全媒体传播,为创新利用红色资源夯实基础。

① 《习近平在辽宁考察时强调 在新时代东北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 奋力开创辽宁振兴发展新局面》,《人民日报》2022年8月19日,第1版。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493页。

## **The Changes over Times and the Inheritance of Red Culture in the Carrier of Role Model Commendation**

Wang Dizhao

(School of Marxism, China Jil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P.R.China)

**Abstract:** Marx and Engels often referred to the concept of “role models,” emphasizing: “Without the examples of the British trade union movement and French workers’ political struggles, what circumstances would we find ourselves in now?” Lenin pointed out: “The role of a living example in action in a certain part of a country is greater than any manifesto or conference.” Comrade Mao Zedong also noted that convincing the entire nation of the correctness of their proposed path and garnering support for revolutionary struggle the nation, advancing construction. Looking back at the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 of history of the CPC, many models and advanced models emerged in the party. Commending role models and exemplary model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thod for our party to transform the country, engage in construction, and carry out revolutionary reforms. Choosing what kind of carrier for recognizing advanced models is inherently a political act. This “carrier” demands a broad conceptualization as “any entity capable of bearing other entities,” encompassing not only explicit recognition forms like language, documentation, titles, awards, and ceremonies, but also the exemplars themselves. The model commendation carrier originates from the great practice of leading people to save the country, revitalize, enrich, and strengthen the nation, chronicling th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and noble character of countless party members. It emblemizes their exemplary spirit of service to the party, country, and people, while simultaneously illuminating the arduous journey and triumphant glory of creating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Over the past century, the CPC’s model recognition carrier has undergone profound transformations influenced by evolving temporal themes,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party construction requirements, and regional cultural variations. Its development trajectory demonstrates a progression from singular to multifaceted forms, from physical to digital representations, and from decentralized to systematized structures, embodying a multidimensional evolu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Notably, the intrinsic characteristics determined by the party’s nature and the inherent noble values of internal recognition carriers remain constant, manifesting an intrinsic unity of typicality and honor, practicality and aesthetics,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spirituality and materiality. The CPC’s model recognition carrier possesses a significant red cultural dimension. Contemporary imperatives include excavating its red cultural genetic code, articulating its historical narratives, establishing commemorative venues, innovating resource dissemination strategies, and enabling these carriers to radiate unprecedented vitality in the new era, thereby aggregating powerful positive energy to propel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Keywords:** Role model recognition carrier; CPC; Advanced model; Exemplary spirit; Inheritance of red culture

[责任编辑:岳 敏 孔令奇]